

神靈之手與長征 蘇穎睿牧師

2016 年是中國紅軍「二萬五千里」長征的 80 周年。所謂「長征」，是指 1930 年代，國共內戰，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圍剿共產黨的紅軍。經過四次圍剿失敗，蔣介石改變作戰策略，終於在第五次國剿中取得成果。紅軍只有逃出他們的根據地—蘇維埃區，經過差不多二年多的時間，穿越大面積的雪山，高原草甸，永久凍土帶和無人區，終於抵達延安建立他們的根據地。

為了紀念紅軍長征，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了一套名為「長征」的片集；在片中竟然提到一位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薄復禮 Rudolf Alfred Bosshardt 的故事。事實上，如果你有機會到中國貴州石阡縣旅行，你一定會參觀那兒紅軍長征時的舊址，現設有一陳列館。你會聽到導遊講述當年紅軍第六團的英勇故事。蕭克將軍帶領約 8000 個紅軍來到貴州的石阡縣，深受當地群眾歡迎，有約 1000 人加入他們的改革行列。她會繼續說：「當地一名外國傳教士薄復禮看到紅軍的革命理想，和英勇的行為，心裏非常感動，並且願意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完成偉大的革命理想。他寫信給在上海的中國內地會總部，要求送上藥品及款項資助紅軍，當薄復禮返回英國後，更撰書大大讚揚紅軍的軍紀和偉大的犧牲精神。」

然而，真正的歷史是這樣的。

薄復禮生於 1879 年之英國曼徹斯特，他原籍瑞士，雖然他家庭移居到英國，但仍保持瑞士的國籍，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、法語、華語及貴州土話。在加入中國內地會之前，曾受過兩年的醫學訓練及神學教育，貴州是中國至貧窮的省份，所謂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」，再加上 1925 年遭大飢荒，他除了傳教外，並負起救災的工作，提供住宿食給饑民，並收養一些孤兒。他曾經歷不少艱辛的日子，如被土匪綁架，又患上傷寒，幾乎喪命，但這一切都一一化險為夷。他於 1931 年與另一位從瑞士來的女傳教士 Rose Piaget 結婚，婚後一同在貴州事奉。

1934 年 10 月 1 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，這天也正是他來貴州 12 周年。那天，他與一班中國內地會在貴州工作的傳教士舉行了一個聯誼聚會，當返回自己的家，途經黃平老城舊州時，突然從叢林中衝出一批紅軍第六團的士兵，他們是從湖南入貴州，盤據於黃平老城之舊州，薄復禮有這樣的記述：

「這些人大都操江西方言，他們戴著同一的帽子，是紅色的。起初我以為是土匪，再看清楚，才恍然大悟，他們是共產黨，帶領這支軍隊的是著名的紅軍將軍蕭克。蕭克當時只有 25 歲，日後他升為中國解放軍的上將，無幾，他們又捉了我們在舊州事奉的同工紐西蘭傳教士海曼夫婦(Arnolis Heman)及他們二個兒女，還有一個紐西蘭的女傳教士 Grace Emblem 一共九人。」

為什麼紅軍要擄走這些傳教士呢？中共官方的解釋是：他們都是帝國主義侵略者，是特務。但蕭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卻坦言的說：

「坦率而言，我們扣留他們主要原因，是從軍事角度考慮。西征以來，轉戰 50 多天，暑天行軍，傷病日益增多，我們知道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及經費。於是我們便向他們提出釋放的條件：為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和經費。」

紅軍提出的贖款是每個宣教士十萬元。但當他們擄劫了這批傳教士七日後就釋放了兒童及婦女，只扣留薄復禮，海曼和 Grace Emblem 三人。但他們所提出的賠款額，仍是相當龐大的。簡言之，這是勒索，也可以說是強迫他們支援。據薄復禮的記述，當蕭克的上司賀龍將軍一見到他時，劈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你要趕快叫你的總會提交款項及藥物，否則人頭落地，就好像我們殺掉那二個德國天主教神父一樣！」

當時中國內地會派出了一個德國籍的傳教士 Herman Becker 前往談判，他是賀龍將軍的朋友。但在談判中，中國內地會依照他們一向慣例，只提供醫藥及一些物資，但為賀龍拒絕。

據薄復禮的憶述：起初，當他們被擄劫後，心裏是有點恐懼。他們被帶到一個馬房裏，鬆了綁繩，紅軍便把他們的衣物歸還給他們。薄復禮發現絲毫沒有損失，連一毫子紅軍也沒有拿走，薄復禮開始覺得這些紅軍頗有軍紀，不像昔日他所遇上的土匪。

他們被帶去見一個薄復禮稱之為「法官」的人受盤問，法官的妻子坐在一旁，定睛注意他們。起初薄復禮直覺以為這女人非常冷酷，但事實卻證明她很友善，好像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。原來這個他所稱為「法官」的是紅軍軍團保衛局局長吳德崢，他的妻子就是戚元德，是紅軍團保衛局的總支書記。審訊後，他們決定釋放薄復禮的太太，海曼太太和二個小孩子，只扣留薄復禮，海曼和 Grace Emblem，戚元德的回憶錄稱她為「洋小姐」。

據薄復禮所說，紅軍在長征中，曾擄劫不少國民黨將領及地主，他們大多數是被處決，其中被處決的也有一些外國天主教神父。但為什麼他們卻沒有殺薄復禮及他的同工呢？不但如此，如今還高度評價薄復禮，稱他為紅軍的英雄，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呢？原來是一個有趣的故事。

蕭克帶領第六軍團進入貴州，原本是計劃在貴州會見賀龍及他的部隊。然而，在匆忙離開湖南時，他們沒有貴州地圖。貴州山多難行，又常常下雨，要攜帶這麼多器械、槍支、行李是一樁非常困難的事。他所率領的軍隊就好像盲頭蒼蠅，到處亂竄，因為沒有地圖指示，軍中又沒有懂得貴州土話問路，結果只在圓方幾里路走來走去，完全沒有方向感。再加上國民黨軍隊追擊，常遇突襲，損失重大，逃兵也不少。看來蕭克這支軍隊會全軍盡滅。一天，他們來到舊州城來，在一所幽靜的天主教堂內，竟然發現到一幅非詳盡的貴州地圖。當蕭克拿到這幅地圖時，如獲至寶，因為這地圖給予他們清晰的方向和地理形勢，這簡直是他們的救星。但當他再看這幅地圖時，他心也沉下來，眉頭也皺起來。因為這幅地圖全是外文寫的，一個中文字也沒有。雖然隊中有些是懂得英文的，但他們也看不懂，因為這不是英文。當時蕭克靈機一觸，想到這些外國傳教士或許會看得懂。薄復禮精通英文、法文、中文，他一看便曉得這是一幅用法文書寫的地圖。於是那天晚上，這兩個年青人，一個是紅軍將領，一個是從遠地來的傳教士埋頭苦幹，把地圖上的道路、河川、村鎮的名字全部譯成中文。那晚，他們不但是翻譯地圖，二個年青人也款款深談，講及他們的身世、往事和抱負。蕭克本來對外國傳教士並沒有好感的，以為是文化侵略，待他們如待地主一樣，但經過這晚後，他完全改變了他的看法，在他的回憶錄中，有這樣的描述：「他(薄復禮)幫我們謄譯了地圖，叫我們在貴州行軍順利，也因此而扭轉局勢，最後得到勝利，若不是他，中國共產黨也不會得到最

後勝利。在困難時得到人的幫助，不管時間有多久，也難忘記。」而薄復禮也開始對紅軍有不同的感受，在他那本「神靈之手」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：

「良心自問，這個只有 25 歲的蕭克，熱情奔放，生氣勃勃。一雙明亮閃閃生輝的眼睛，充滿信心和力量。他不屈不撓，顯而易見，完全不是我所想像的「土匪」。如果有共產黨徒都好像蕭克及其部下的紅軍，那麼共產黨是不足為懼的了。」

這兩個青年人，各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，一個目睹家仇國恨，毅然棄筆從戎，加入共產黨，用武裝推翻國民政府，繼而投身在新中國的建立。一個因著耶穌基督的大愛，不遠千里來到中國至窮的地方，冒著土匪、疾病、內戰等危險，把基督的愛帶給中國人。他們二人有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人生抉擇，後來他們又怎麼樣呢？

先談談薄復禮。離開舊州後，開始了他隨紅軍長征的生活。據他所記述，生活非常艱辛，他數次病倒，幾乎要死，又擔心、又想念他新婚的太太。更慘的他屢次被恐嚇，以致他長期活在「恐懼」之中。他曾經企圖逃去，但卻被捉回，也曾主動向紅軍要求把他處死，因為他受不住這些精神壓力，及後，他們先後釋放了「洋小姐」和海曼，他心也安定下來，他沒有忘記他來華的目的，一有機會就向一些友善的紅軍傳福音，也深得一些紅軍之愛戴，他更為賀龍的初生嬰兒織衫保暖。經過了 560 天的拘禁，行了 2500 多里路，終於在 1936 年的復活節在雲南昆明附近被釋放。臨行前，蕭克設宴歡送他，又給他盤川，與他家人重聚。

薄復禮並沒有因受過這麼多折磨就離開中國。相反的，他繼續在中國傳道，在八年抗戰期間，更與中國人一同經歷日本人之蹂躪，但他仍忠心傳福音，但 195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驅走所有外國傳教士離境，薄復禮被逐出中國。當他返回英國，他繼續向當地的華人傳福音，他又把他在中國的經歷寫成「神靈之手」一書(The Resting Hand of God)，講述他這 560 日的經歷，是第一本非常詳盡有關長征的史實，是研究紅軍長征常珍貴的歷史文獻。

而蕭克呢？他在抗日戰爭及共內戰中立下汗馬功勞。他雖然曾一度擔任國防部副部長，但因被賀龍、彭德懷及毛澤東排斥，被指為「反黨不良份子」，剝奪軍權，更在文化大革命時，被下放勞改，生活非常艱辛，用他的話說，他所犯的罪是「排錯隊」。1978 年獲平反，但後又因六四事件，反對鄧小平用坦克鎮壓天安門之學生，又被排拒。晚年時他只用心於教育事業上創辦了炎黃春秋雜誌，企圖揭露歷史真相，但可惜習近平上場後，炎黃春秋也被封了！但他所寫的一本小說「浴血羅霄」獲茅盾文學獎，他更編著「中華文化通史」巨著，委實他是一個又文又武的將軍。

在 80 年代，蕭克竭盡辦法尋找薄復禮之下落，終於找到了，彼此再次有機會聯絡，並為他所寫的「神靈之手」譯成中文，又為他寫序，在序言中，他說：「我們擄劫了薄復禮，但他卻寬恕了我們的罪，他的寬容和愛心，是極令人感動和欽佩的。」

二個人的結局，一是永恆，一是短暫，一是感恩，一是幻滅，你會選擇那一個呢？